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

郭 齐 勇

作者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中国特色 文化资源 现代性

提 要 “中国特色”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继承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华, 融摄了现时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吸取了中国与东方百多年来走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弘扬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和富民、重民、惠民、安民、教民的长治久安之道, 启导我们发掘古代丰富的政治资源与道德资源, 并作创造性的转化。我们不能以现实性、功能性限制这一理论的包容性、开放性与根源性, 以便沟通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 推动三大传统与三大资源新的整合。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是对西方文明和传统中国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晶。这一理论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 决没有脱离人类文明与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大道; 相反, 它集中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原则, 同时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

一、“中国特色”释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 又是中国特色的。其中, “中国特色”含有三层意义。第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数十年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尤其是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是百多年中国走向世界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积淀。第三是中国几千年精神文明的承续与发展, 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发现、开掘和认同。这后一方面还很少有人论证。

“中国特色”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涵盖了东方 (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 固有的优秀的文化传统, 涵盖了现时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 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运动是世界化的过程, 但同时又是民族化的过程。

“中国特色”不是凝固化的概念而是流动着的概念，它是根源性与时代性的整合，是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统一。

人们常常容易把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对立起来。实际上，不同时空的文化总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整合，是二者互动、互渗的结果。根源性与全球化不总是相互拒斥的，完全可以同时并存、健康互动。体现了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的现代化理论，不只属于中国或东亚，它一定能从中国、东亚进入全球。它的民族性、根源性很强。唯其如此，它的世界性也很强。

人们常常容易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包含着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积淀着的丰富的优秀传统精神的结合。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识，力行实践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用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季羨林先生说：“有观点认为，搞国学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匪夷所思，实在让我大吃一惊。搞国学，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在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国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这个实际中就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①我很同意季老的这个观点。

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们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②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立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三个有利于”、“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等思想，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核是“以人民为主体”。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语言与传统典籍的语言文字的特色一样，言简意赅，看似浅显、平易，实则深奥、高远。就民族性的内涵来说，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诗经》、《尚书》、《春秋》、《礼记》、《论语》和《周易》经传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尚书·大禹谟》引用大禹的话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可见，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兴利除弊，解决民生问题、温饱问题，使人民丰衣足食，是第一位的。《尚书》中所谓“六府三事”，根本上是以养民、富民为治民之首。周革殷命之后，周武王向殷遗臣箕子请教治国方略。箕子讲了九条治国之道，是谓“洪范九畴”。其中主要内容是以诚敬之心训诫官民兢兢业业发展物质生产，并实行教化，使政治清明，以安定天下。《论语》所载孔子“惠民”、“富民”、“教民”、“安民”、“先富后教”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思想，《孟子》之“爱民”、“利民”、“重民”、“民贵君轻”、“保民而王”、“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然后导之以善的思想，《荀子》的“爱民”、“利人”、“和人”、“富国”、“强国”、“以礼正国”的思想，都是我国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经验。历史告诉我们，“马上打天下”的经验不能用于“治天下”。历代贤明的统治者为治世之需，大多选择中正平和的施政安民的良策。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

加以适当的损益,使之合于当世,平易合理,为朝野所能接受,便于应用。其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

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思想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之重大的、本质的区别,是“以民为本”还是“以民为末”,是“以民为主”还是“以民为从”,是尊重传统还是毁弃传统,是回归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还是背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中国古代传统的“政在养民”、“敬德保民”、“厚生”、“惠民”、“裕民”、“富民”、“重民”、“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固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甚至蜕化为粉饰太平、掩盖统治者的阶级本质的工具,但总体上仍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与愿望,是古代知识精英对治世的总结,是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大本大源。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和道德价值资源,例如民本思想、民贵思想、民有思想、民富思想、官与民同享同乐思想、载舟覆舟思想等,是可以作出现代转化与现代诠释的。从周公到谭嗣同的民本主义,都是建立在爱护、尊重人民的意志、欲求,首先是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的,然后进行教化,增进德性,以求得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邓小平思想在这一点上是源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邓小平“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当然与传统社会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有质的差异,现代社会的“民主”与传统社会的“民本”也有内涵的不同,但不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中国传统中也有民主意识的根芽。

摒弃充满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否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的“文革”,以法制秩序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力,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有道德能力和有知识能力的人,建构秩序化的富国富民的现代化运作体系,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贡献。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总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并坚持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和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治国方略,辩证地分析了改革、发展与稳定、分散与统一、市场与计划、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群体与个体等等关系。在这一方面,也渗透着传统中华文化的价值。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模式不同,在东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明智的行政工程起着主导的作用。以强有力的国家来整合社会各方面并调控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家、民族、社会、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尊重个人,但不导向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民族间、人民间、人际间的和谐、协调比冲突、紧张更为重要;比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膨胀更重视家庭的稳定和谐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文化教育;提倡忠孝信义的道德观念,肯定节俭、勤劳、忠诚、奉献、敬业的个人品质;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意识和国民的凝聚力;如此等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是东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的内在基础。这表明,东亚与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已经并将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这一视域来观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肯定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保留与转化,可以赋予“中国特色”以深度的文化内涵。

二、发掘固有文化的政治资源与道德资源

孙中山先生是亚洲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他曾经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

，是强调道德教育，重视精神价值，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修养，启导每一个人的良知良能，创造性地扬弃，建构社会主义伦理体系，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

，仍然可以纳入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之中。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仍然是我们不同阶层、

“”，更是我们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基本尺度。

，恪守做人之道，体悟生活的意义世界，使我们觉识到生命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并以此安身立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主义的覆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的。

，也可以活化市场经济。

，处理好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在各种力量面前，保持弹性和节奏感，处理好政府与企业、

，也是一门高超的管理艺术和管理美学。

，而注重群体和谐，在注重关心不同人的利益分配的同时，更加肯定敬业乐群，勤奋和睦，刻苦耐劳，互助合作，提倡上下同心协力以及对国家、

，强调为子孙后代造福等等，对于重建社会公正、

，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调整民与官、

，将有助于进一步健康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5年，邓小平说：“，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⑤ 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不仅提出了抓住时机、

，不仅提出了“”，但重点是反“”，尤其阐明了精神文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

，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搞法制靠得住些，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⑥

，人类生存状态的困境和危机进一步凸显，终极关怀的旁落，新的矛盾层出不穷，亦往往根源于不同的民族。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日益世界化、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又日益追求归乡与故园。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告别“”，在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重新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

，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提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文化永恒发展的新的思路，提示人类新文明和东亚新文明发展的新思路。

(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传统)，珍视中西方渊源各自的文化精神，加以创造性的整合，正是克服当代人精神危机的重要资源，国际国内社群整合的问题和天、，中国和东方精神价值有其用武之地，当然要在现实的背景上作艰苦的创造性的转化。包括儒、，不是不能普式化，需要以多维的评价尺度和诠释维度审视，并视之为我们现代化的内在基础。

，本土传统的，而且相互补充，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斗争和排斥的，反而“沿门托钵效贫儿”，那就会丧失对自己文化的发言权，而无补于现代化的事业。自觉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需要重新拥有我们自己的传统，需要重建中国人的人文理想和民族精神，需要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广博的胸襟，面对古今中外的制度文明与文化精神，丰富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发扬光大。

① 《 》1996年8月3日第8版

②③⑤⑥ 《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28 229 110 378-379页。

④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